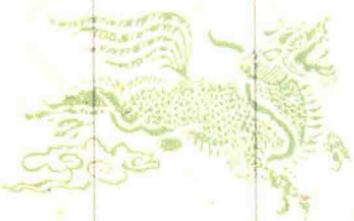


龚自珍词学研究

习婷◎著



清华大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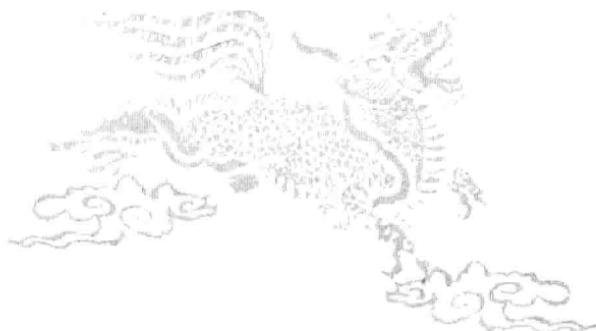


卷一百一十五



龚自珍词学研究

习婷◎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自珍词学研究/习婷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7924-9

I. ①龚… II. ①习… III. ①龚自珍(1792~1841)—词学—研究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7821 号

责任编辑：左玉冰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2mm×228mm 印 张：14.75 字 数：18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38.00 元

产品编号：061378-01

绪 论

龚自珍，字爱吾；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字尔玉，又字璱人，号定庵，又号定公、定庵道人，晚年号羽琌山民。乾隆五十七年（1792）生于官宦之家。父丽正，母段驯，段玉裁之女。龚自珍的一生颇为传奇。他才高八斗，却常遭人诟病；襟抱远大，却沉沦下僚；一生郁郁不得志，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毙于丹阳，死因成谜。

龚自珍于道光元年（1821）将之前所作文章选编为《定庵文集》，并刊刻行世；道光七年刊《破戒草》、《破戒草之余》，道光二十年再刊《己亥杂诗》。其个性张扬、见地卓绝的政论文，才气纵横、雄奇瑰丽的诗歌，名噪一时。龚自珍早年所作政论文皆言词犀利、见解独到，被江沅誉为“云霞在目，天女之衣，光采奇异……龚子之文，从无敌于汉以来天下”。王昱评其诗文“绝世一空，前宿难得”^①，影响尤为深远，“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②。从事维新运动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熏染；稍后如南社诸君子，亦无不瓣香龚氏。龚自珍以余力为词，有词集五部，与其诗文相比，定庵词风迷离绵丽，别有一番韵味。

① （清）龚自珍著：《定庵文集》，道光自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②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 页。

龚自珍作为晚清思想家、启蒙者，其文学亦离不开其经学、佛学等思想孳乳。龚自珍外祖父段玉裁师从戴震，精通小学。龚父为段玉裁入室弟子，能传其学。龚自珍十二岁时，段玉裁亲授许氏《说文》部目，开始“以字说经，以经说字”。龚自珍幼承庭训，受戴震一派之古文经学影响甚深。二十八岁的龚自珍在京城遇到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刘氏讲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公羊学与龚自珍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从此，龚自珍便醉心于今文经学，与常州学派刘逢禄、宋翔凤等经学大家，往来频繁。但他并无古文、今文门户之见，而是以其通达的学术观念，采两家之长，为己所用。青年时期，龚自珍倾心佛学。他曾拜江沅为第一导师，晚年“尤好西方之学”，整理、刊布了许多佛学经典。佛学思想与龚自珍恣肆张扬的个性极为不协调，一方面，他嬉笑怒骂、愤世嫉俗；另一方面，他又受佛学思想的制约，要求自己“无住无寄”，归于虚静，这使得龚自珍一生颇为矛盾，因而他有多次戒诗与破戒之举。就词的创作及词学观念而言，龚自珍以词尊情，其思想的轨迹、情感的变化都是词作的抒写内容，经学、佛学等思想都是铸造龚自珍词风及词学观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书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龚自珍的词。他十九岁开始填词，共有五部词集，分别为《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及《庚子雅词》，词作共约一百五十六篇。五部词集均由龚自珍亲自编定，《无著词》、《怀人馆词》大多选其早年的词作，《庚子雅词》一卷均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所作，其余词作的准确写作时间待考。定庵词的写作内容、风格特色、前后期变化都是龚词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书的另一研究对象，即龚自珍的词学观。词盛于宋，然而词学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于词的创作。清代，词学进入全面总结期。清代词学家纷纷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旗帜鲜明的词学流派。针对明末“淫亵”与“叫嚣”之流风，清人开始反思和总结

词体特征,力图为词的复兴与尊体,开辟一条正途,如朱彝尊的醇雅说、张惠言的意内言外说,周济的寄托说等。龚自珍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其时正值浙西词派、吴中词派及常州词派此起彼伏,代胜词坛,而他不为流派所牢笼,自成一家。龚自珍并没有系统的词学思想,仅在几篇序文中提到对词的看法,没有浙、常家法的胶固,而别有见解,这些想法或被后来学词者吸收,不乏启发之功。因此,龚自珍的词学观及其价值与意义实在是清代词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环。

本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龚自珍所处的时代背景、交游情况、思想动态及其地位影响等。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社会矛盾日渐凸显之时。面对政治上的动荡、学术思想的新变,龚自珍不得不做出更多的思考,这些都使得他的思想时刻发生着变化,继而影响着他每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词中细腻的、私密的情感变化就是佐证。另外,与同时代的词学群体的交游,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龚自珍的词学观念。龚自珍与浙西、常州、吴中等词派成员均交往密切,其词学观中也不无这些词派理论的痕迹,然而,龚自珍对这些词派理论也并非一味简单接受,更多的是选择性地纳入自身的思想体系,并最终融为一体。

词派更替与发展是清代词史、词学史的基本特征,但龚自珍词突破常、浙藩篱,别具一格;龚自珍词学观更不受理论流派所限,特立独出。有清一代,超脱于流派之外,保留自己风格的词人实在不多,能有龚自珍这般成就的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无论是对清词史还是清代词学的讨论,龚自珍都是不可回避的。

一、龚自珍研究学术史概况

晚清民初,对龚自珍的关注尚停留在对其诗歌的模仿及思想的崇拜上,除吴昌绶、黄守恒等人整理有龚自珍的年谱外,鲜有人从事关于龚自珍的其他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龚自珍初步进

入学术研究视野。至新中国成立前,针对龚自珍的研究尚出于研究者的一时兴趣所在,而并非学理性的深层次的系统研究。这一时期以单篇学术论文为主,其内容也是多种多样,有关注其诗的,如《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张荫麟《燕京学报》)、《龚定庵的诗和词》(周策纵《国光杂志》);也有涉及词的,如《性灵词人龚自珍》(方子川《复旦学报》);还有关于其思想的,如《龚定庵思想之分析》(钱穆《国学季刊》)、《龚定庵之史地学》(朱杰勤);另外还有《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下篇·丁香花疑案再辩》(雪林武汉大学)、朱衣《龚自珍诗词中的恋爱故事》等论文。

20世纪50年代,关于龚自珍的研究没有太大进展,发表的论文仅13篇,且学理性不足,多是作者对龚自珍的一些感性认识,如余琪的《记龚自珍》(《新民晚报》)、袁汀的《龚自珍与广东》(《羊城晚报》)、孙甄陶的《龚自珍的认识》(香港《大学生活》)、振之的《龚自珍的一首诗》(《新民晚报》)等;60年代起,龚自珍的思想成为了主流研究对象,一时间关于龚自珍经济、政治、哲学思想的论文相继涌出,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改革思想,而其文学则基本被忽视。70年代,龚自珍被作为倡导社会改革、反儒尊法的先锋,得以大力颂扬,仅具有改革精神和高唱反帝制之歌的诗篇备受关注。直至70年代末,龚自珍文学研究才基本回归正途,但此时的研究对象还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病梅馆记》、《己亥杂诗》这两部作品。80年代至今,龚自珍研究逐渐全面展开,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佛学思想研究、作品研究、交游考略等诸多方面,成果颇丰。专题资料汇编则有孙文光等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含论文汇编就有管林等著的《龚自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朱杰勤的《龚定庵研究》(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陈铭主编的《龚自珍研究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郭延礼的《龚自珍研究论文集》(附于《龚自珍年谱》后,齐鲁书社1987版)、陈铭的《龚自珍综论》(漓江出版社1991

年版)、邹进先的《龚自珍论稿》(南海出版公司 1992 年版)、张寿安的《龚自珍学术思想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997 年版)等这一系列著作,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从事龚自珍研究的坚实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关于龚自珍的论文共计 740 余篇,其中龚自珍的政治、哲学思想始终是研究的热点,其次是诗文,而关于词的论文仅 7 篇。学位论文仍以政治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博士论文有研究其哲学思想的两篇,硕士论文虽然多达 21 篇,但也集中在哲学、政治、伦理、美学、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上,^①研究格局并不平衡。

二、生平、版本、选注、辑佚

1. 年谱编纂与生平研究

关于龚自珍的年谱整理,最早有吴昌绶所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梓行的《定庵先生年谱》,有文编年。吴昌绶为浙江仁和人,生于 1867 年,与龚自珍同乡。他极为敬仰这位同乡先贤,在龚自珍去世约六十年后,校辑了《定庵全集》并编订了《定庵先生年

^① 博士学位论文共 3 篇:《龚自珍哲学观新论》、《龚自珍研究三题》、《龚自珍的文化意识及其曲折》。21 篇硕士论文中,有《龚自珍的哲学思想研究》(1992 年中山大学)、乔志强《龚自珍学术思想初探》(2002 年西北大学)、《龚自珍的变法思想研究》(2005 年西南政法大学)、刘朝阁《龚自珍公羊学思想研究》(2006 年杭州师范学院)、雷友华《龚自珍社会思想研究》(2007 年重庆师范大学)、李洪强《龚自珍论“我”》(2007 年华东师范大学)、《龚自珍伦理思想研究》(2007 年东南大学)、平建东《龚自珍政治思想研究》(2008 年中国政法大学)、张高元《龚自珍美学思想研究》(2009 年西南大学)、《龚自珍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和转化》(2009 年广西大学)等 10 篇之多。其次则为龚自珍诗文研究,其词研究论文两篇,分别为李艳艳《龚自珍词研究》(2009 年广西大学)、李瑜《龚自珍词及其词学观研究》(2010 年中山大学)。另外,还有港澳台地区的学位论文:《龚自珍研究》(2008 香港大学)、《龚自珍之生平与思想》(香港大学)、《龚自珍诗歌研究》(2006 台湾师范大学)等。

谱》。吴谱基本勾勒出了龚自珍的一生经历，材料较为真实可靠，后人年谱基本都是以吴谱为蓝本，加以修正、增补而成。但吴谱较为简单，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梳理，这也给后人充实龚自珍的年谱资料，留有很大的空间。另外，吴谱中仅对定庵文有编年，且不尽准确。

同一时期还有，黄守恒所撰，于宣统元年（1909）作为上海时中书局版《（校订）定庵全集》附录面世的《定庵年谱稿本》。黄守恒“刺取集中（按：《定庵文集》）事实缀为年谱稿本”，失之简略；又补录龚橙挚友日记中关于龚自珍的记录，但疏于考证，穿凿之处，间或见焉。

另外，逸事类的记载有陈元禄《羽琌逸事》，是对吴本年谱的有力补充。陈元禄为龚自珍子龚橙妻弟，龚自珍生前与之有过从。陈元禄所用材料都来源于龚自珍本人与龚橙，因而较为鲜活且可靠。另有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缪荃孙《羽琌山民逸事》（神州国光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龚自珍全集》附录的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基本就是汇集《羽琌逸事》、《羽琌山民逸事》而成。

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郭延礼所著《龚自珍年谱》，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郭谱采用正文加注的格式，谱主的生平、思想、重要论著皆于正文中论述，间或加以必要的评论，有些与谱主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简介也放在正文中，而有关生平史实辨伪，著作年代考证、龚氏一般交友介绍，以及材料来源，均在小注中出现。这样，整个年谱主次分明，脉络清晰，有条有理。郭谱对定庵诗词进行了系年，对当时一些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龚氏是否参加过“宣南诗社”、龚氏晚年所谓“尤好西方之书”，此“西方”是指西方的欧美，还是指西方的佛国等，折衷是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郭谱仍不免有错漏，尤其是对作品系年，仍欠完整。

鉴于前人所作龚自珍年谱的各种不足和错漏,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对龚自珍生平事迹再详加考订,该书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较广泛地采用了龚自珍同时代人的诗、词、文集等资料,对旧谱未载的龚自珍事迹做了许多补充。比如嘉庆六年(1801),龚自珍年方十岁曾有诗与母亲及叔父唱和一事。对旧谱中龚自珍诗文注本及有关论著所载龚自珍的生平经历做了不少辩证,对龚自珍作品的写作时间做了许多考证,提出了不少新的或与《郭谱》等旧谱相异的见解。另录入了诸多旧谱未载的龚自珍亲友所写与其相关的作品,考出多名旧谱及龚自珍诗文注本姓名不详的人的名讳,订正了王佩诤校本《龚自珍全集》中部分文字的错讹衍夺。书中有为龚自珍的家属、亲戚及交游共计400余人写的小传或简介,以便读者通过这些人物更深入地了解龚自珍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说,这是目前关于龚自珍生平最为翔实的著作。

关于龚自珍的生平传记,也颇值得关注。陈铭的《龚自珍评传》是最早的一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书介绍和评述了龚自珍的哲学、政治、历史、经济、伦理和文学思想,评价了龚自珍的诗、词、散文创作,充分肯定了龚自珍在中国古代、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和创作对近代社会的重大影响。此书的侧重点在于龚自珍的思想,对其文学的论述略显不足。2005年,陈铭继而出版了《剑气箫心——龚自珍传》,此书基本上是介绍龚自珍一生经历的通俗读本。同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若鹏的《龚自珍评传》,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评传,下编为龚自珍交游考略。此书的价值在于为龚自珍交游做的详细考证,较樊克政在《年谱考略》中穿插的亲友小传或简介,麦书的交游考略,显然更为清晰。交游考略一共涉及133位龚自珍友人,每人都有生平小传以及与龚自珍交游的详细介绍。

由以上成果可知,今人对龚自珍的年谱编纂与生平研究已经较为完善。这些年谱资料,基本还原了龚自珍的生活经历、时代背景以及交游情况,这为进一步开展龚自珍的思想、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联系龚自珍的生活经历,就能更客观地掌握其哲学观、社会观、文学观形成的缘由以及其思想变化动态。

2. 作品版本刊刻情况

龚自珍于道光元年(1821)开始陆续整理自己的文学作品,并编定成集,现有自刻本《定庵文集》存世,存于国家图书馆,分《文集》三卷,《余集》一卷。道光三年(1823)自刊《定庵别集》四卷,即《无著词选》、《怀人馆词选》、《影事词选》、《小奢摩词选》各一卷;道光七年(1827)再刊《破戒草》、《破戒草之余》;道光二十年(1840)刊《己亥杂诗》。龚自珍逝世后,其子龚橙请魏源编定《龚自珍文集》。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编《定庵文录》十二卷,《定庵外录》十二卷,并为之序。然《定庵文录》乃稿本,并未付梓,现已亡佚。龚橙不满魏源所编,故自己重新删选,录文九卷,诗词三卷,凡十二卷。龚橙重定文一至八卷抄本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诗词卷有《风雨楼丛书》本,后为邓实所刻。咸丰辛酉(1861),龚橙手抄先集定本为《孝拱手抄词》,今存国家图书馆。另有杭州谭献抄存本《定庵文集》,同治元年(1862),魏锡曾将谭献抄本重抄,为《定庵龚先生集外文》。同治七年(1868),曹籀嘱吴煦刊印《定庵文集》,分上中下三卷、续集四卷,这是除自刻本外流行于世的第一个《定庵文集》七卷刊本。吴本乃汇聚当时世面流传的各种定庵文集而成,并非其自言之“依自刻本”。同年,吴煦再刊《定庵文集补》四卷,包括《古今体诗上卷破戒草》、《古今诗体下卷破戒草之余》、《杂诗》、《词选》。光绪十二年(1886),朱之榛刊印了《定庵文集补编》四卷本。朱本出之汤伯述,乃汤伯述从龚氏后人

处搜获原自刻本，检对吴本，增补所缺而成。《定庵文集》推吴氏、朱氏二刻而已，其后诸本大都依吴、朱二刻，稍有增拾。光绪二十三年(1897)，万本书堂刊印了《龚定庵全集》十二卷刻本：分文集三卷、续集四卷、补文集一卷、补编四卷(续录、古今体诗、杂诗、词选)，基本是集吴、朱二本而成。同年又刊宝墨斋丛书石印本《龚定庵集》十四卷，分文集三卷、续集四卷、补编一卷、又补编一卷、三补编一卷、古今体诗二卷、杂诗二卷、词一卷；同年，江建霞又影刊《定庵续集》(即《己亥杂诗》)。至此，龚自珍全集的编例基本形成。

清末民初，定庵集的刊刻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各种全集相继付梓。如1902年，刊文汇书局石印本《定庵全集》；1909年，刊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庵全集》十卷，同年又刊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庵全集》十四卷，分文集三卷、续集四卷、补编四卷、补续录一卷、文集补一卷、拾遗一卷，内附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一卷；1910年，刊扫叶山房石印《定庵全集》十五卷本，凡文集三卷、续集四卷、文集补续录一卷、文集补三卷、文集补编四卷；1911年上海秋星社石印《龚定庵集外未刻诗》一种；民国初年，有影印本《龚定庵诗词》印行；1913年，有北京《中国学报》本的《定庵书札辑》；1922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吴煦刊本《定庵文集》十二卷，又影印朱之榛本《定庵文集补编》四卷；1923年，中国图书公司排印《龚定庵全集》十七卷本；1927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定庵文集增补》十七卷本；1935年，上海国学整理社刊王文濡编校《龚定庵全集》世界书局发行，同年，又刊上海襟霞阁本《龚定庵全集》，有上海新文化书社刊《龚定庵全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刊《定庵文稿》十一卷；1937年世界书局刊夏同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1941年，中华书局刊本局所辑注《龚定庵文》。在这一轮刊刻高潮中，以1910年邓实校勘的《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价值最大，该本系《风雨楼丛书》之一，

邓实得龚橙手定本四卷，遂将读《藏》经之文，编为《定庵别集》，其诗词则曰《定庵诗定本》、《定庵词定本》，其诗词在定本之外，而又为吴本及诸本所无者，则汇刻为《集外未刻诗词》。

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王佩铮校《龚自珍全集》，后附有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诸家序跋和《龚自珍佚著待访目》，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两册本合为一册本，后补入张祖廉撰《定庵先生年谱外纪》。此本汇众集所载，精编而成，为目前收录作品最全的龚自珍全集。

今人对龚自珍作品的刊刻情况也有一些梳理，孙文光的《龚自珍研究资料集》收录有吴刻本、朱刻本等多种版本的序跋，惜不甚完备。樊克政编《后人辑刊龚自珍著作各版本汇录》，《后人辑刊龚自珍著作系年》，不但对后人辑刊龚自珍著作做了编年，更汇录了各种版本序跋，较为详尽，所涉及版本基本涵盖了现存可见的龚自珍作品集。

3. 选本、注本、辑佚

目前，龚自珍诗文的选本、注本（包括选注）有万尊巍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选《龚自珍的诗文》（1979年版）、刘逸生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刘逸生注《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唐文英选注《龚自珍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孙钦善选注《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基于刘逸生、孙钦善诸先生的努力，龚自珍诗的阅读障碍已基本扫除。

辑佚方面，王佩铮校注《龚自珍全集》书后，存有《龚自珍佚著待访目》，详细列出佚文目录，惜佚诗、佚词目录不详。潘建国《新见清龚自珍己亥佚札考释》（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二期），所辑佚札是龚自珍于己亥出都前写给何绍基的，内容颇为重要。樊克

政对辑佚致力颇深,《龚自珍年谱考略》书后,附有《龚自珍佚作补录》,经过多番考证和资料查阅,书中补录了不少王校本中未见载录的佚文,然与王佩铮所列的佚文目录对勘发现,多数佚文尚待查访。

三、定庵词研究

历来学界对定庵词的研究较为薄弱。迄今为止,关于定庵词的研究以单篇论文为主,另有硕士论文三篇。博士论文、学术专著尚未出现。

1. 《定庵词》编订、辑佚、笺注、编年

龚自珍五部词集都是由他亲自删选、编订而成。自刻本《定庵别集》即《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部词集。据龚自珍跋文可知,《无著词》始名《红禅词》,凡九十二阙,道光二年(1822)春选录四十五首,道光三年(1823)夏付刊;《怀人馆词》原集凡九十阙,道光元年(1821)春日选录三十二首,《影事词》,原集十九首,道光元年(1821)春选录六首,二集均于道光三年(1823)六月付刊;《小奢摩词》一卷,原三十三阙,删存十五首,补入旧作,合为二十首,道光三年六月付刊;道光二十年(1840),龚自珍又将本年词作辑为《庚子雅词》。除《庚子雅词》外,其他四本词集,在龚自珍生前均已刊行。龚自珍去世后,龚橙曾请魏源编定龚自珍文集,魏源编《定庵文录》共二十四卷,惜魏源定本未曾付刊,今不得见。龚橙又将魏源所编《定庵文录》删至十二卷,诗词卷有《风雨楼丛书》本存世,即邓实所刻《定庵别集诗词定本》及《集外未刻诗词》。另一个龚自珍词集的版本是咸丰辛酉(1861),龚自珍之子龚橙所抄的龚自珍词定本,即《孝拱手抄词》,今存国家图书馆。《孝拱手抄词》是龚橙所抄龚自珍自刻本词集,但龚橙对其尊人词集多有改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龚自珍全

集》中,词的部分,基本集自刻本、《孝拱手抄词》及风雨楼本所成。

定庵词原稿二百三十四首,龚自珍自己删存一百零三首,所裁半数以上;另又有魏源及龚橙所删改的词作,因此,现今全集中所存词并非定庵词之全貌,定庵词的辑佚工作,极有必要。但由于定庵词流传于世时,就已经由龚自珍亲自删定,所以,词集未选之词,已难寻见,故辑佚工作难度较大,成果也相对较少。《龚自珍全集》附录的《定庵作品待访目录》中,佚词目录尚未整理出来,论文只有李华英《龚自珍佚词一首》(《西湖》1984年第7期)、北山《龚自珍佚词一首》(《词学》第一辑)、樊克政《关于龚自珍的一首佚词——〈谒金门·孙月坡小影〉》(《文献》1994年第4期)等。

关于龚自珍词的笺注,目前成果不多。早期有孙钦善《龚自珍诗词选》,对部分词作有简要的解析。杨柏岭《龚自珍词笺说》对定庵词作了一个基本的梳理,书中对每首词作出了注释,还有相应的解说。龚自珍词基础研究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词作的系年。理清定庵词发展的轨迹,并且联系当时的背景,对定庵词作出更准确的解读,就必须基本确定每首词作的写作时间。郭延礼在《龚自珍年谱》一书中,对部分定庵词作了系年,然其中有不甚准确之处;樊克政在《龚自珍年谱考略》中对郭谱中系年词作有进一步考订增补,最终基本确定了八十四首词作的写作时间,但仍有近一半作品编年未详。

2. 词作分析

李艳艳硕士学位论文《龚自珍词研究》、李瑜硕士论文《龚自珍词研究》是目前较为系统的龚词研究论文,李艳艳文章以探索龚词的情感内容和艺术特色为研究重点,分别对其词学理论、词作所呈现的情感世界和艺术风格进行专门探讨。但对龚自珍的思想阐述比较单薄,对版本考察较为简单,文章没有涉及龚自珍的交游,对龚自珍所处的历史、文学背景都没有必要的交代。李

瑜文从定庵词的创作分期及行迹考述、内涵、风格特色、“箫剑”述评等方面剖析了定庵词，并阐述了龚自珍词学观内涵，对龚自珍词学观与常州词派词学理论进行了比较，同样对于龚自珍的交游、思想等外延问题涉及较少。

目前，关于定庵词的研究仍以单篇论文为主，基本按词的内容、意象、风格及其形成原因等词学研究的传统路径展开。定庵词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以爱情词为主，间或有怀人、赠答应酬之作。定庵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莫过于“箫”“剑”“落花”“灯”等意象，关于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研究者们也有所关注。徐永端《试论龚定庵词》就指出“明灯”乃龚自珍理想的象征，“落花”则是其孤独飘零的身世象征；郭玲《定庵词的典型意象分析》对定庵词中的“梅”“箫”“灯”三种意象作了简要的分析。作者认为“梅”代表了作者隐归的心愿，也暗喻心仪的女子，还暗喻佛禅；“箫”有时指代灵箫，更多是以箫喻凄凉；“灯”则更多地体现定庵沉郁哀怨的生活体验，透露出孤独之感。李锦全《试论龚自珍思想的两重性矛盾——读定庵诗词》认为，龚自珍在诗词中讲“箫”“剑”对举，反映的正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研究者往往对意象的象征意义，做了详细的阐述，但是，对龚自珍选择这些意象的原因却语焉不详，而从龚自珍的思想源头上来探求龚自珍意象选择的深层原因，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由于龚自珍词中多幻想、梦境，研究者们往往将龚自珍词的风格特征归纳为迷离。管林等人编写的《龚自珍研究》认为，“迷离，是龚词中言情之作特有的色彩”。苏利海的《龚自珍词学研究》同样认为龚自珍的词完全是从一己情性出发，以词达情，以词传情，以词遣情，故其风格迷离惝恍，而其感情特征则是悲凉。陈铭的《龚自珍评传》将定庵词的特征归结为哀艳。刘媛媛的《末世文人的悲怆与苍凉——略论龚自珍的词》指出，龚自珍词作反映的正是他孤独、飘零之感，悲怆、苍凉之情。应该说，定庵词风格